

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

(2019)

周群
◎主编

吴四伍 鱼宏亮 吕文利 董欣洁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

(2019)

周群 ◎主编

吴四伍 鱼宏亮 吕文利 董欣洁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 2019 / 周群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9

ISBN 978 - 7 - 5201 - 5386 - 7

I. ①清…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文集
IV. ①K249.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1892 号

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 (2019)

主 编 / 周 群

副 主 编 / 吴四伍 鱼宏亮 吕文利 董欣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郑庆寰 陈肖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2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386 - 7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目 录

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代序）	高翔 / 1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	瞿林东 / 3
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	周群 / 30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清史研究	赫治清等 / 34
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	/ 34
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	/ 37
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 40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清前中期大国治理与经济思考	/ 44
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 40 年	李治亭 / 47
以旧充新、罔顾事实	
——“新清史”若干观点辨析	杨益茂 / 67
理藩院体制是清朝藩部管理的重心吗	
——谈新清史“满洲殖民主义论”的史实错误	刘文鹏 / 72
跳出“汉化”与“胡化”之争	陈宝良 / 76
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	祁美琴 陈骏 / 80
“后伯希和时代”中西方内亚史学严谨性的丧失：《重释内亚史》	
补笔	钟炘 / 96
“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	刘文明 / 109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	杨华 / 133
如何书写全球史学史	董欣洁 / 152
互动视角下东亚文明史的空间结构	
——兼论中国的历史空间	魏孝稷 / 173

国家转型：明代还是清代？

——有关明清国家性质的新理论与新研究	鱼宏亮 / 201
陈廷敬与清初社会秩序重建	朱昌荣 / 207
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	张永江 / 216
试论藏传佛教的王朝化与国家认同	
——以清朝敕建藏传佛寺为中心的考察	祁美琴 安子昂 / 236
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考论	安介生 周 妮 / 260
青浦教案及鸦片战争后条约体系的突破	王海岑 / 271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前奏	
——1899 年前君主国定位的形成与演变	邓华莹 / 284
清末民初“国家构建”问题再阐释	刘文鹏 / 299

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当代价值	马大正 / 304
中国边疆学构筑是中国学人的历史担当	马大正 / 311
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	
——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	吕文利 / 323
理解结构：清代形成的嵌入式互动格局	吕文利 / 339
1808 年西沙测绘的中国元素暨对比尔·海顿的回应	丁雁南 / 344
明清时期陆上西部丝绸之路再审视	吴四伍 / 358
明清丝绸之路与世界贸易网络	
——重视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鱼宏亮 / 367

· 附录 学术会议报道 ·

“清代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 377
我校召开 2018 年清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座谈会	/ 379
清代西北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暨“新疆流人史与流人研究”项目	
开题报告会举行	/ 381
学者聚焦“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第七年全球史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 383
后 记	/ 385

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代序）

高翔*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向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发来贺信，对如何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为历史研究服务现实提出了殷切期望，赋予了神圣的时代使命。

“述往事，思来者”，明道求真、以史经世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也是历史研究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动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真正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冰冷的学术过程，而是充满情怀、抱负、灵感的科学探索。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弘扬优良传统，自觉地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中，去中流击水，去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展现当代中国历史学独特的科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近些年来，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高层次的史学活动，必须紧紧围绕长时段问题、全局性问题、本质性问题展开，重视规律总结、理论概括和提升，坚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必须立足中国的土地，说中国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推出体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鸿篇巨制。真正的史学研究必须有思想、有灵魂、有立场，照抄照搬、拾人牙慧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只有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中国的话语阐释人类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对话和交流。

在学术活动中，尊严来自实力，地位取决于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切理解时代需求，正视自身在水平、能力上的差距，发奋努力，有所作为。

世界史学思潮风起云涌，诸家之说，“各执一端，崇其所善”。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成果评价方式，集中全国精锐力量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围绕关系全局的重大学术前沿问题开展攻关，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对话交流，清晰响亮地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营造出成果、出人才的良好氛围。

推动新时代我国历史研究繁荣发展，让中国史学走向更加辉煌未来，我国史学研究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定当奋发有为，用优秀的学术成果书写时代进步的华章。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

瞿林东*

一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只有在明确了它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之后，才可能对其学术定位做出某种设想或建议。这就要求我们从什么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谈起。

什么是中国史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它是指在中国古代史学上，那些具有批评意识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或其他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既包含着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往往伴随着分歧和异趣，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意见、分歧、观点互相讨论、辩难的史学活动、史学现象，我们称之为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既不是“挑眼”，也不是“吹捧”，相互间不论是赞同的意见还是不同的意见，重在“发现”并提出问题；而对问题的阐说，则启发着时人与后人或加以发扬，或引以为戒，这就是史学批评的产生及其意义。如此这般的一个个史学批评个案的联系，构成了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的史学批评史；一个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史，构成了连续不断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这样，研究者可以揭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异同，可以概括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史学批评的特点，并以此探索、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进而为提炼出理论问题提供依据。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从纵向上看，上起先秦的春秋时期，下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系作者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导论。

迄清代中期(1840年以前)。从横向上看,它包括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及各方面学人对史学的批评;其涉及的文献亦不限于史部书,经部、子部、集部也在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在研究中能够发掘一些有关史学批评的新资料和以往较少涉及的知识领域,尤其希望在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并对其做出合理的阐述,从而通过集体的努力,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学科。

那么,怎样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做学科定位呢?第一,从宏观领域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当属“中国历史”一级学科范围之内,当毋庸置疑。第二,从研究内容与特点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与中国古代史学史关系密切,离开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史学批评中提出的问题及相关的论述,都可能涉及理论上的分析,而脱离了史学理论的史学批评,就会成为没有思想、没有内涵的材料堆砌。有鉴于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

为了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同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撰述之联系及区别,以凸显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概括说来,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面貌及其规律的历史;中国史学批评史,是研究中国史学史上存在于其间的一个最活跃的内部动因的历史,即批评与反思,包含批评的意识、批评的思想、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及各方面成果(思想成果和著述成果)。尽管史学批评史同史学史存在密切的关联,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因而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不同,撰述的主要内容自亦有所不同。这一联系与区别,是不应被模糊处理的。

本书题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而未以“评论史”命名,也是意在突出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记得十几年前,有位记者问我:您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为什么不用“评论”而用“批评”?我一时语塞,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这说明自己并不很清楚它们之间有何异同;再说我另有一本论集,书名就叫作《史学与史学评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小书受到一些同行尤其是中青年朋友的关注,这些年来,研究史学批评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似乎用“批评”一词也就习以为常了,因而很少有人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讲,却没有放下这个问题,总想对此做一点探究。其间,也翻阅了几本从理论上讨论学术批评的书,有中国学者写

的，也有外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但它们都是立足于文学批评而展开的，有的还是从解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批评做阐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讨论多是建立在西方学术文化中所谓“原生质”的、“科学”的“批评”与“评论”概念基础上的。这对我提高理论上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但由于学科的不同，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毕竟不能获得原本所需要的借鉴。这就促使我从“传统”中去寻求认识问题的路径。

中国古代学人使用“评论”一词说事，当不晚于魏晋之际。三国魏人王肃所注《孔子家语》中记述叔孙武叔这个人有个缺点，“多称人之过，而已评论之”，^①因而受到颜回劝告。又《三国志》裴注引王隐《晋书》记：“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②这里说的回避“评论”是对“至慎”的肯定。与此不同的是，王隐《晋书》还有另外的记载：“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后也。亮直清方，见有不善，必评论之，王公大人望风惮之。”^③这两处说的“评论”，都是指评论时事，评论人之秉性。此外，也有说到评论史书的。如葛洪《抱朴子》记：

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遽也。^④

这里说的“评论”，即是关于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的评论。又如，五代时，刘昫等著《旧唐书》说到唐太宗时重修的《晋书》，这样写道：“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奇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⑤

①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第240页。

② 《三国志》卷18《魏书·李通传》，裴注引王隐《晋书》，中华书局，1962，第536页。又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与上略同，杨勇校笺本，中华书局，2006，第16页。

③ 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第18页。

④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0《明本》，中华书局，1985，第184页。

⑤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中华书局，1975，第2463页。

上述这两则关于史书的评论,前者是肯定的评论,后者是借用时人之语发表了包含负面评价的评论。又有明人郭孔延撰《史通评释》,其序称“向以己意为之评论,虽未必合作者之意”云云。^①显然,这是对评论者的评论。

至于中国古代学人使用“批评”一词,至晚见于葛洪所著、邵雍纂辑的《梦林玄解·占梦》:“占曰:梦殊砂,为官爵,为文章,为批评,为银财之本,为血气,为良药。”^②此处所讲“批评”,没有明确指向,不便妄测。而元代学人是较早从学术的意义上使用“批评”一词的。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有《仇远批评唐百家诗选》一书,其别集类著录《仇远金渊集》六卷。^③仇远精于诗,时人称为“仇远先生”,《元史·张翥传》记:

翥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东大儒也,其学传于陆九渊氏,翥从之游,道德性命之说,多所研究。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扬,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④

从这一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得知仇远在唐诗研究上的造诣,乃有《批评唐百家诗选》之作,在中国古代学术批评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学人在奏疏与书信中亦往往使用“批评”一词。如魏允贞《条陈救弊四事乞赐采纳以弘治道疏》中有这样的话:“分别式样,以授主司,圈点批评,列置卷首,后先及第,海内士人,无不愤叹。”^⑤这是反映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弊端。李贽的《寄答留都》写道:“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⑥徐芳的《与高自山》一文中

① 郭孔延:《史通评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序,第1页。

② 葛洪:《梦林玄解》卷12《文墨·五色颜料》,邵雍纂辑,陈士元增删,何栋如重辑,《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4页。

③ 参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中华书局,1955,第8425、8435页。

④ 《元史》卷186《张翥传》,中华书局,1976,第4284页。

⑤ 参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87,中华书局,1962,第4195页。

⑥ 《李贽集》第1卷《焚书一增补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58页。

更是有这样轻松的话语：“诗文传阅，取笑批评，烂如圈点，互相诤炫。”^① 由此可知，在明代的公私文件中，多有“批评”一词的使用。

综观上述所举事例，可以认为，大约在一千七百年前，中国学人已将“评论”和“批评”的概念置于不同学术领域之中，以此表述和阐说各自的学术见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表现。这种现象在元明以降显得更加广泛。由于前人在使用“评论”和“批评”一词时，并未对其做出明确的解释，故难从实质上划清二者的界限。但中国学人有重视字义和慎于遣词造句的传统，^② 由此仍可略知“评论”和“批评”的一点区别：“评论”是评量和议论，意在对事物做出适当的评价；“批评”则兼有批判和评论之意，即既包含正面评价也包含负面评价的双重目标，因而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质言之，“评论”多用于泛指；“批评”则与学术讨论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获知古代学人对“评论”和“批评”有更明确的定义或阐述前，姑作此说。

二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大势与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大势是怎样的？其间有哪些主要问题是需要展开讨论的？这是本书需要明确的问题。

这里讲的“发展大势”，上起先秦春秋时期，下迄清代中期（1840年前），约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撰述工作的需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看待。由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点，这七个阶段是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同时又各具特点。

第一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孔子评晋国史官董狐以及孟子和《左传》评《春秋》，揭开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序幕。此后，史家修养和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中国史学上人们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春秋》的评论与继承、发展，班彪、班固父子对司

① 参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162，中华书局，1987，第1630页。

② 如杜佑自谓：“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义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通典》卷42，中华书局，1988，第1167页）《说文解字》：“论，议也。”段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者谓之论。”凡此，均可参考。

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先后产生了《史记》《汉书》两部宏伟著作。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开端最重要的标志。同时,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而分别对各类历史文献做出评论,分别写出了《别录》和《七略》,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撰述做了资料上的准备。东汉末年,汉献帝认为纪传体《汉书》烦冗难读,由是荀悦乃有编年体《汉纪》之作,从而为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画上句号。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良史,书法不隐和史书三要素论(事、文、义),以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论,以及立典五志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等。

第二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学多途发展的学术背景下,学术思想的活跃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关于《史记》《汉书》的批评,开这一时期史学批评之先河,同时反映出了与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衔接;关于《三国志》的批评,则表明时人对它的关注。有关上述三部“正史”的批评,对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史学家们关于“史例”及国史“条例”的讨论,推动了有关史书编撰形式的评论。其中,关于史书起源问题的讨论,可谓时代特点使然,对后世多有启发。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史书内容和史家修养的各种批评意见,构成这时期史学批评的主要部分。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在总结此前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可视为一篇史学批评史论纲,堪为中国史学批评初步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是:素心,信史,烦省,评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及由立典五志演变而来的书契五善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和注史四旨论(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等。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隋唐时期)。唐初关注对以往众家晋史与南北朝时期所撰正史的批评,反映了在政治统一局面下历史撰述的新的要求,由此奠定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宏大气势。《隋书·经籍志》史部对十三类历代史书的评论,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最早的和最全面的总结;其史部大序对史官职责的表述,反映了史家对历史撰述的高度重视。关于“史才三长”学说的提出与“良史”观念发展,增进了人们对史学主体的认识;关于治学宗旨的讨论,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关于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

识,在这个时期的《史记》注、《汉书》注和《后汉书》注中,均有所发挥。以上这几个方面,均可视为史学批评深入发展的表现。而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则是刘知幾的《史通》一书。这部“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有讥刺焉”^①的书,是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的史学理论著作。它的重要性可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刘知幾同时代人徐坚说的:“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②

这一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直书,曲笔,鉴识,探赜,疑古,惑经,以及史学功用论,史才三长论(才、学、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论,史官辨职论,编年纪传论,师古与随时(稽古与随时)论,行状不实论等。

第四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五代两宋时期)。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旧唐书》面世,至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刊行后,围绕两《唐书》、两《五代史》的修撰、比较而展开的史学批评,受到学人的关注。而《资治通鉴》的撰成则直接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不论是司马光的自述,还是宋神宗的评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通鉴》学”勃然兴起,朱熹、杨万里的相关评论又昭示了新的史书体裁即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郑樵、李焘的史学批评,前者上承司马迁,后者接续司马光,进一步丰富了史学之“通”的观念。《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及各门小序,对史学的由来、社会功用、史官职责、作史原则、撰述流程中的种种情况等做了概括和评论,显示了类书中蕴含的史学批评思想,凸显出“史学事业”的新观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称“日夕躬以朱黄,讎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③这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之学术批评思想积累以至形成的艰辛历程。欧阳修不理睬他人对其爱好金石学的嘲讽,坚持《集古录》的研究和撰述;而赵明诚《金石录·序》进而申言,“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具有“考其异同”的作用;赵明诚夫人李清照在此书后序中写道,此书“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④综上,类书、目录书和金石之学

① 刘知幾:《史通》卷10《自叙》,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71页。

② 《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第3171页。

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5页。

④ 赵明诚:《金石录》,金文明校证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531页。

中包含的史学批评,是这时期史学批评的几个特点。宋代学人撰写了大量的史料笔记,其中多有自觉的补史意识和史学批评思想,是这时期史学批评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文学之士关注史学,通观其所批评,往往得失两存,但有胜于无,重在分析和判断。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公正,议论,记注,疏谬,不实,非才,法世,会通,以及信史论,史家源起论,良史“四足”论(明、道、智、文),纪事本末论,史法论,作史三原则论(事实、褒贬、文采)等。

第五阶段:民族史学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中国自秦汉起成为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地理条件、历史环境、文明进程的差别,各民族史学的发展迟速不一。由于文字的困难和文献的不足,我们对民族史学尚缺乏较深入的研究。应当强调的是,这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批评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民族史学在史学思想、史学批评意识方面,或许在针对性上和具体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中国史学上的经典文献、著名史家以及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等,都是民族史学发展中的评论对象。《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①这里自然包含萧韩家奴对这些历史著作的评论。同书《列女传》记:“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②《通历》是中唐晚期史家马总所撰的一部简明的编年体通史,常哥读而又能“品藻”,说明有深刻的认识。《金史·世宗本纪中》记:“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③同书《世宗本纪下》记:“上谓宰臣曰:‘朕近读《汉书》,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④这里所记当指范曄《后汉书》所叙史事。金世宗对《资治通鉴》《后汉书》的评论当不止于此。《元史·仁宗本纪一》记:元武宗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

① 《辽史》卷103《文学上》,中华书局,1974,第1450页。

② 《辽史》卷107《列女传》,第1472页。

③ 《金史》卷7《世宗本纪中》,中华书局,1975,第175页。

④ 《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第202页。

命……刊行，赐臣下”。^① 这个评论虽有些夸张，但表明了元武宗对此书的重视。又，《元史·察罕传》记元仁宗同察罕有这样一段对话：

帝尝问张良何如人，对曰：“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又问狄仁杰，对曰：“当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贤相也。”因诵范仲淹所撰碑词甚熟。帝叹息良久曰：“察罕博学如此邪。”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②

上文举出的几个实例，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的真实存在，同时也反映了与民族史学相关联的记述中史学批评思想的真实存在。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是：“史笔天下之大信”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论，“事”与“道”关系论，文献论，“理”（义理、事理、文理）、“情”（人情）评判标准论，心术为修史之本论等。

第六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与前景（明时期）。这时期的史学批评，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诏修《元史》，至明末朱明镐《史纠》面世，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关于前朝正史的修撰与评论，由《元史》上溯元修三史、两《五代史》、两《唐书》，直至《史记》，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之连续性的特点。关于修撰本朝史过程中的评论，既表明时人对史学认识的深入，也表明存在各种歧见。随着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辩证思维在史学批评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可谓经典之论。关于刘知幾《史通》的研究和评论在这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而相关专书的问世，凸显了批评之批评的活力。与此相关的是多种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专书涌现出来，以及对有关概念的讨论等。以上这几个方面，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明代史学批评的开拓、进展，同时也可以使人们看到以往被长期忽略的一个积极的史学倾向：明代学人对理论的兴趣。正是这几个方面，使人们看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前景。

在明代学人所编的目录书中，用“批评”一词冠以书名者，并不是个别

① 《元史》卷24《仁宗本纪一》，第536页。

② 《元史》卷137《察罕传》，第3311页。

现象,如《批评后汉书》《批评自警编》,^①前者是批评史书,后者应是为自我修养而作。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朝末年,学人在书名上冠以“批评”一词的现象更为普遍。据明崇祯刻本张溥所著《历代史论》(一编四卷、二编十卷)二编目录附《正雅堂古今书目》所载,冠以“批评”一词的书名有:

批评二十一史全部 (嗣出)

批评仪礼经传集解

批评礼书乐书

批评文献通考

批评通志略

批评杜氏通典

批评函史

此外,还有用“批论”一词的,如:

谭友夏批论庄子

再者,也有用“评选”一词的,如:

周介生先生评选丁丑大题自携 (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丁丑小题宝持 (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丁丑名家宝持 (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皇明历科小题 (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皇明历科程墨 (嗣后)

孙孟机吴扶九两先生评选易参 (即出)

七录斋评选皇明易会 (嗣后)

^① 参见祁承燠《澹生堂读书记 澹生堂藏书目》,郑诚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35、373页。